

輯一
歷史時刻

第一章

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論綱

——重讀托克維爾，梳理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的創生脈絡

紀霖宗兄設壇，囑咐我來做演講，半月來一直在想這件事，深感以此論題，鋪展「革命」、「立憲」和「國家理性」，而以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及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作為切入點，實在是非常具有眼光的選題。有此綢繆，因應之下，便想從遠距離、長時段、大歷史的角度，緊緊圍繞着晚近三百年來中國和世界的大致宏觀走勢來談，這樣可能較為恰切。同時，這並不限於此一人一書，而是從此人此書，引申開來，在「現代」和「現代秩序」的誕生這一大背景大變局下，省思「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而藉此更作深廣闡發。其空虛不免，而「大視野」三字庶幾自慰也。

置此整體構想，圍繞核心命題，大致講下列五個問題。一是革命，阿倫特（Hannah Arendt）意義上的革命，而非一般俗常的騷亂、暴動、造反或者「改朝換代」；二是在此情形下，駸駸乎而來的現代秩序與雙元革命的問題；三是因順流而下、遞次嬗變所導致的國家、社會與政治的複雜糾聯。凡此三因素的連環互動，映照並坐實着革命、立憲和國家理性的歷史脈動，構成了晚近現代秩序的核心變量；四是基此流變，由此演繹出的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第五，我想最後談一下所謂的「文學政治」或者「文人政治」這一「托克維爾話題」。

一、晚近三百餘年，革命是發動裝置，蔚為歷史的扣眼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如本節標題所示，晚近三百年來，革命是一個發動裝置，並且蔚為「歷史的扣眼」。就是說，衣服有鈕扣，經由扣眼而扣合，綱舉目張，衣裝遂成衣裝。形制既顯，興致聯翩，遂成所謂繁華。在此歷史時段，「革命」正是這樣一個「扣眼」。實際上，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漫長的十九世紀」，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與戰爭」的年代。

就此，有六點內容需向各位陳述。

第一，何為「革命」？此處所說革命，非暴動、非起義、非改朝換代，而是一種「開端」，一種政體變革。而且，革命是政治權威崩潰的結果，在歷史終結的意義上，其後所建立的政體不會再遭遇革命，由是政權獲得了永久性正當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來表徵。換言之，今天談論革命，很顯然是在法政哲學和歷史哲學，而非一般俗常政治意識形態的語境下，從近代長程社會政治變革和歷史轉型的大視野來談的政體演變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運動。實際上，樞紐時代以還，近代的這一波政體變革，以革命開道，自歐美起步，將全球拉入這一歷史進程，而為萬世開太平。因此，在阿倫特的意義上，「暴動」「起義」等屢次上演的「改朝換代」不是我們此刻所說的革命。革命一定意味着一種「開端」，

一種政體變革。它作為一種政治權威崩潰的結果，導致一種新的政體和政治權威誕生，蔚為政治的創世紀，講述的是這樣一種歷史進程、政治運動和社會、思想轉型。在此，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回顧晚近三百年間發生在東西方各國的具有典範意義的革命，可以發現，革命既是「開端」，則革命之後它所形成的新型政體和政治權威之所以不會再度重蹈「被革命」這類政治覆轍，就在於所謂的「歷史終結」。就是說，現有的人類政治想像力和政治實踐能力，無法再於可見的歷史時期內營造出足堪取而代之的新型政體；實際上，此後人類為了克服這一政體的缺陷而進行了種種試驗。雖然本心本願旨在創造更加美好的治理，結果卻將人類驅進泥塗，不得不遞次宣告退出。從而，歷史終結了，所以上文說「為萬世開太平」。

第二，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引出下面的問題，即晚近三百年間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七大革命。我原來一直講「六大革命」，沒有把德國因素考慮在內。最近思考紀霖兄佈置的命題作文，沉吟既久，遂覺「德國問題」具有典範意義。「德國問題」之所以過去長期未曾提上議事日程，可能是礙於英美文化的強勢主導，晚近德國革命和德意志轉型的重大意義給遮蔽了。所以這次把它單獨提出來，稍微多做一些檢視。

在典範意義上，七大革命，即英、美、法、俄、德、中、阿拉伯（伊朗之為一種亞型）

革命及其特點，各具歷史意義。各位知道，從一六四〇年代開始的英國革命，開啟了「現代」進程，三百餘年間，延綿不絕的所謂的革命的歷史進程，席天幕地，開天闢地。通常說，英國革命從一六四〇年開始至一六八九年大致「收工」，長約半個世紀，逮至「人權法案」公佈，一般的史家認為這時候革命就算結束了。而在我看來，立足於大歷史，則英國革命至少延續一個世紀以上。實際上，一直要到兩次征伐美國之後，英國的外部邊界在北美基本止於美國獨立這一局面，才算內政安頓下來，革命也才算基本結束。內政和國家間政治之互為條件和轉換，於此彰顯無遺。就是說，英國革命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至少延續一個世紀以上，不可不察。與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相比，英國革命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即英國革命一般來講是基於貴族與國王的分權運動而展開的，所走的是一種普通法的立憲主義，以一種法權安排，以一種相對安全、較為不血腥、較為非暴力的方式達成目標。當然，不是說它沒有暴力和血腥的場景，但相對而言它以小規模、少震蕩、低頻度的上層之間權力的分割，尤其是在財產權上的分割以達成妥協來重建英國的現代政體。英國學者麥克法蘭（Ailun Maikafalan）在講述這場革命時喟言，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一種較早傳統的復辟，是對詹姆斯二世圖謀的那種革命的抵制。因此，英格蘭的發展史是一部漸進的、連貫的、進化性的發展史，是一種「變化的同一」（the

changing same) ，而非如法、俄、中的革命，疾風驟雨，摧枯拉朽，確實有道理。¹ 所以英國革命一般認為是以自由為指向，而以財產權的分割、以財產作為自由的物質保障和政制保障來實現革命目標為機制的。

法國革命另有一景。它是基於阿倫特所說的「難以忍受的社會狀況」而來的。尤其是對於貧困及其痛苦的意識，以及基於這種意識而來的對於它們的不能忍受，基於對於此間極度的匱乏狀態的深切而不可遏止的同情，基於同情而來的要求社會變革這一強烈的革命動因。其之憤然而來，倏然爆發，確乎特立獨行，多所不同。我們知道，托克維爾反思法國革命，基本上着眼於其為一起重大社會事件，看到它源於政治權威崩潰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並且帶來了最後的政治變革這一錯綜複雜的政治特性與精神個性。僅就歷史進程而言，在我看來，法國革命當然不僅僅指「一七八九」，也不只是「一七九三」的雅各賓專政前後連綿的那幾年。毋寧，法國革命其實包括後來的波拿巴的復辟等等，一直要延續到第三共和國，方始音消響歇，平定下來。也有一種講法，認為第三共和國還不足以收束這一革命勢能，一直要顛簸動蕩，至到一九五八年的第五共和國方始收束。我覺得，以第三共和國作為它的下限，大致不差。這樣看來，它也是一個一百多年的社會政制與思想文化的劇烈的變革進程，歷九死而後生也。

美國革命起於盎格魯—撒克遜 (Anglo-Saxon) 民族的「家務糾紛」，而終於釀成了一個分家過日子衝動下造成的立國故事。在現代主權意識的鼓動下，美國革命肇基於分家過日子建設獨立的主權公共空間這一契機，由此啟動，導致了內政的相應變革，進而造成了後來包括黑人民權運動在內的解放和獨立的歷史進程，綿互連貫，將立國和立憲糾結一團。在我看來，這場運動起自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日，延續到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方始告一段落。至少，延續至一九世紀中葉的南北內戰，也是個百年進程。如果說這場基於主權獨立衝動和立國動機，而接續造成了政體轉換和社會建設、平權訴求，一波接續一波，因此必須得將黑人民權運動包括在內才算完整的話，那麼，可能這一革命其實一直延續到一九六〇年代才算結束。換言之，逮至其時，其立國政治和立憲承諾方式全部兌現，美國的立國進程才算完結了。雖說這是一種更為誇張的講法，但不管怎麼說，其為一場長時段的故事，延續了一百多年，倒是大實話。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起重要的革命事件，那就是德國的近代轉型，德意志文明的自我更新。德國近代的自我更新不僅起步於、體現在一八四八年那場遍及歐洲的運動，而且表現為一八七一年俾斯麥通過戰爭、計謀和國家理由所實現的德國的統一。其間接續以後來的《魏瑪憲法》，一直到了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柏林牆倒塌、兩德

統一，方告結束。其為一個完整的、長程的革命進程，更是歷九死而後生。直至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也可以說是健康的德意志，才算是最終成形。一場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漫長革命，代價慘烈，觸目驚心。從這個角度來看，以羅馬文明的正統繼承者自居，而以德意志文明作為歐洲主流文明自詡，這場德國人經過內戰、外戰、自我革命而實現的歷史轉型，最終奠定了現代德意志這方家國天下。可能，如各位所同情共感，與「中國問題」最為相像的其實就是「德國問題」，以及下述的「俄國問題」。

我們的鄰國——俄國從彼得大帝改革到後來的斯托雷平改革，再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終至一九九一年的「革命的反革命」，也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艱難歷程。其與近代中國歷史轉型頗多相像之處。最為相像的地方在於，兩個國家都曾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左翼極權專制。同樣相像的，還有它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商社會、從一個以億萬小自耕農和一個高高在上的皇權政制兩級化的結構，就是黃仁宇先生所謂的「潛水艇夾心麪包」這樣一種結構，向理性化的現代國家建構過渡的進程。各自耗時一百多年，而展現出一種有別於歐美型英法道路的形態。

除開上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六大革命以外，諸位可能都注意到了，伊斯蘭世界的自我更新進程，同樣是一場規模宏大而遷延既久的社會政治大變革。實際上從十九世紀開始，

埃及和土耳其學習西方、向西方靠攏進行社會和政制改革，締造現代的軍事和工業，打造伊斯蘭世界成為現代國家和社會。直到兩年前發生伊斯蘭—阿拉伯革命，這一橫跨整個北非和中東、綿延一個半世紀以上的重大的社會歷史轉型，尚未完成，而構成了近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景觀。這場以伊斯蘭文明為主要載體、以阿拉伯各民族為主要的實踐者，超過一百五十年以上的立國運動，一場重大的政制和社會轉型，構成了通常所說的現代性的全球拓展的重要方面。今天討論近代的革命，當然不能遺漏它們。其間頭緒紛繁，輾轉牽連。僅就伊朗而言，它是波斯文明現代轉型的典範。伊朗的情形複雜，其為波斯民族，不屬阿拉伯大家庭，卻又接受了伊斯蘭教，因而，更多一分糾結，也更添一分為難。伊朗的現代轉型及其與基督教文明的對峙，較諸包括中國在內的大轉型，提供了一個處置大國關係的另一種亞型典範或者次型典範，太值得研究了。其之伊斯蘭憲政主義，囊括神俗及其分權制衡，實在很有特色。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講革命，包括法國革命在內，至少有這樣七大革命。這七大革命，長長短短，從縱橫一個世紀到綿亙一、兩個世紀，構成了近代人類世界三百年輝煌而慘烈的時段，僅次於「諸子時代—樞紐時代」的最為重大的轉型時期。革命不是別的，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發動裝置，也是這三百年來將人類歷史串聯起來，並徹底改變了這個地球

面貌的「歷史扣眼」。

第三，我們仔細審視、分析這七大革命，將之分類，大致可以得出這麼三脈，即「英美型」、「法國型」與「德國型」。第一脈是所謂的「英美型革命」，多半時候，一說現代轉型，通常必說英美一系，概以其為重商主義的民族，秉持經驗理性，持取相對平和漸進的進路，諸如此類。的確，相對而言，英美的轉型比較成功，也比較具有典範性。更主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和平轉型的經驗教訓，等等。相對而言，法國型的革命，包括中國、俄國以及我們的近鄰越南等法國式革命的諸種亞型，雖時空有別，具體訴求表述不同，但均訴諸法式大革命的狂飆突進，在將盧梭式的理想先置於並且取代了洛克式的理想之際，血流成河。凡此政治運動和政制實踐，把盧梭放在洛克之前，則以社會革命為主而以政治革命作為最後的變革結果的歷史運動，堪為狂飆突進式革命範型，動蕩既久，成本太大。當然，另一方面說，此間跌宕，非惟人力所能掌控。自家歷史走到這一步，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然。因而，長程的中國革命，的確確，是在法國革命範型理想下推動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包括一八六〇年之後以洋務運動為標誌，到甲午海戰而終止的為期三十五年的第一次改革開放，包括一九〇二年啟動的清末變法、北洋的改良、民國的新政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為止的又一個長逾三十五年的第二次改革開放，包括一九七八